

有事群衆商量

遼東書店編印



有事和群眾商量

遼東書店編印

1947.9

『群眾的意見與經驗，一定要爲我們政策的基礎，因爲人民能給我們許許多多事情。我們的任務，就是聽從他們，學習與了解他們，再作爲政策交還給他們。』

——毛澤東——

目錄

特點：消滅敵人發動農民	陳伯達	(四)
有事和群眾商量	明芝	(一四)
是誰不放手對誰放手		(二〇)
土地政策與發動農民	冠西	(二四)
賓縣對於放手問題的研究	杜襲	(二八)
群眾路線與非群眾路線	王鶴壽	(三三)
對羣衆路線的了解	于杰	(四一)
羣衆路線的檢討與掌握		(五九)
綏東工作團激發羣衆路線的經驗		(六五)
依靠貧雇農與緊緊團結中農的路線		(六八)
工作方法與作風上的羣衆路線	紅心原	(七二)
加強貧農小組的領導是農運中心環節		

陳政委報告：消滅敵人發動農民

爲繼續消滅敵人，發動農民，創造鞏固強大的遼東根據地，遼東分局、遼寧省委於本月六日下午召集各直屬機關千餘幹部會議，由遼東軍區陳政委報告目前形勢與任務。陳政委首先着重指出：『我們現在是處在東北形勢發生根本變化的新時期，因此，我們全黨全軍面前的偉大的歷史任務；就是：消滅敵人發動農民，創造鞏固的強大的遼東根據地』。他繼分析目前東北敵我鬥爭形勢說：『東北自從向敵展開夏季攻勢以來，僅僅三個禮拜，已殲滅將比正規軍五師多，收復二十二個縣城，我軍已由被動變主動，由分散到集中，由防禦至進攻，這一新形勢到來，乃是由於東北翻身了的人民的力量，乃是由於北滿主力三下江南，與遼東全體軍民四保臨江，年來艱苦奮鬥的成果』。陳政委提醒全體同志說：『雖然捷音頻傳，但我們仍處在全面反攻前的過渡階段，到勝利還須經一段艱苦奮鬥的過程，爲了繼續消滅現有敵人及其必來的援兵，除前線軍事勝利外，我們必須動員所有能抽出的幹部，到新收復區，幫助人民翻身，創造根據地，這是遼東戰局成敗的關鍵，也與改變全國形勢快慢的有關問題，有些同志單純興奮，急躁，是不能解決問題的』。

陳政委繼續談到這次下鄉的目的謂：『我們下鄉的同志要煮熟飯，不再煮夾生飯，摧毀農村封建地主銅骨水泥的堡壘，讓廣大受壓迫的農民真正翻身，真正滿足百分之九十的基本農民土地要求，切勿重蹈過去半生不熟的錯誤。』

陳政委提出四個要求：首先要徹底摧毀封建地主鞏固堡壘，為此對地主封建力量應是先徹底打垮，而後照顧，打垮與照顧不能同時並兼；關於獻地，只有個別的可以，一般的不要獻地，防止某些地主借獻地爲名，而匿藏其土地財產。除對漢奸、惡霸、大地主徹底清算外，其他在政治上壓迫農民而爲農民所痛恨的中小地主封建爪牙等，也不得妨害而且要滿足農民的鬥爭要求，但在鬥爭中必須取得中農的贊同。

陳政委提出下鄉的第二個要求是：創造爲群眾所擁護的眞正積極份子。他除告大家要警惕偽滿殘餘封建爪牙和流氓成份在鬥爭中混入農運竊踞領導地位外，並提出今後選擇培養積極份子的條件：（1）又勞又苦，（2）貧農優農，（3）青年壯年，（4）大公無私。在工作方式上要提倡：「找好人找窮人」，要「慢慢的找，細細的查」。通過各種方式徹底瞭解積極份子。

第三個要求，是走群眾路線。陳政委諄諄告誡所有同志：我們過去未將群眾眞正發動起來，除了某些客觀原因外，主要的是我們未走羣衆路線，以致地主未打倒，流氓當道，羣衆未動起來。糾正這一錯誤，今後在領導方面不要包辦代替，要辨明是非，即不要把少數人的意見當成多數人的意見，也不要將多數人的意見當成少數人的意見，這就須要領導幹部打開腦筋，開動機器。至於用什麼方法能使農民發動起來？陳政委指示：不論發動鬥爭或分地都要經過思想醞釀，打破顧慮，切不要操之過急，因此要農民訴苦，提高覺悟，並對其進行時事教育，使其眞正認識到與地主鬭爭的必要性和鬭爭勝利的可能性，羣衆是否發動起來，應以落後羣衆是否起來爲標準。

最後陳政委強調提出我們工作「又要透不快」，在羣衆組織方面，名目不要多，要以農

會爲核心，一切通過農會。陳政委勉勵下鄉的同志，只要下鄉發動羣衆的仗打好了，根據地建立起來，有力的支援前線，我們就能勝利，他鄭重指出：發動羣衆同前方打仗同樣重要，並號召保證把這一仗打好。

（遼東日報六月九日）

有事和群眾商量

陳伯達

(一)毛澤東同志的主要思想方法：「必須明白群眾是真正的英雄，而我們自己是往往幼稚可笑的，不了解這一點，就不能得到起碼的知識；和全党同志們共同學習繼續當一個小學生。這——是我的志願。」上面這些話，是毛澤東同志在「農村調查序言」裡所寫的。「我還是一個小學生——群眾的小學生……，群眾的意見與經驗，一定要為我們政策的基礎。因為人民能給我們許多事情。我們的任務，就是聽從他們，學習與了解他們，再作為政策交還給他們。」上面這些話，是毛澤東同志對一個外國記者所談的。大家看，一個中國有歷史以來的最傑出最偉大的人民領袖中國人民解放事業的舵師，他對於自己的看法不過是群眾的小學生；但是我們必須知道這就是毛澤東同志的所以偉大；毛澤東同志的所以能够最正確地指導中國人民事業前進，指導中國共產黨前進，是因為他能够甘當群眾的小學生，能够集中群眾的意見變成指導的智惠。許多人都想學習毛澤東同志的思想方法，但是往往把它看成奧妙的似乎不能為常人理解的「天書。」或者不願意學習毛澤東同志這種向群眾學習的主要思想方法，而成為許多同志犯錯誤的根源。事實：毛澤東同志這種主要思想方法是人人可以學習的；但是正如毛澤東同志所說：如果「沒有滿腔的熱心，沒有眼睛向下的決心，有求知的渴望，沒有放下臭架子與甘當小學生的精神，是一定不能做也一定做不好的。」給羣衆當學生，是必須恭謙勤勞與採取同志態度的；否則他們就不理我，「學習毛澤

東同志這個主要思想方法，對於任何一個共產黨員所遇到的困難，不是個人有沒有能力的問題，而是肯不肯下決心的問題，這是換腦筋，這是思想的革命。

(二) 兩條不同的工作路線。做任何事情，歸根到底有兩條不同的路線：一條是官僚主義的路線，特長就是命令主義，只是向群眾強迫，只是簡單地向群眾要東西，只是閉門造「計劃」，造「公報」，千篇一律硬套在群眾上面；另一條是群眾路線，乃是向群眾學習，聽取群眾意見，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力量給群眾的東西，隨後才用百分之十或百分之幾的力量向群眾要東西。至於所要的東西就是爲的用在群眾的事業上面。而不管在任何場合，決不是從超空間，超時間的公式出發，而是從當地當時群眾的具體情況出發。前一條路線是反毛主席的路線，後一條路線就是毛主席的路線。按照前一條路線做事情，就必然把事情辦壞，就必然引起羣衆不滿，而不是一事情做得好。能受羣衆充分擁護的，總是按照後一條路線去做的。按照官僚主義路線辦事的同志，或者覺得他們那樣做也能够「完成任務」，而且還可以「做得快」省得「麻煩」。實際上，這類同志完全不了解我們的任務沒有別的，我們的任何任務都是一爲人民服務爲人民的利益；一切任務都必須首先和人民羣衆商量，在羣衆面前弄清楚，在羣衆充分討論，爲羣衆所同意並由羣衆自己動手起來，這是羣衆路線，又正是對人民負責。劉少奇同志在修改黨章報告上說得好：「我們黨員受了黨的領導機關與領導人的命令去進行工作，他們在工作中是要對黨的領導機關與領導人負責的；但如果把這種對黨的領導機關負責與人民負責分開來看那是錯誤的，必須對人民負責才算盡了最後與最大之責任……每個黨員對人民負責，即是對黨負責，對人民不負責，即是對黨最不負責。要理解對黨負責與對人民負責的一致性，要使二者統一起來，不使二者割裂開來對立起來。如果

發現自己領導機關與領導人所指示的任務，政策和工作作风有缺點錯誤時，即應以對人民負責的精神，向領導機關與領導人建議改正，要弄清楚是非，不應馬虎敷衍，否則就是對人民沒有負起責任，也就是對黨沒有負起責任。」一切事情經過羣衆路線來考慮，來進行，就是對人負起責任。而官僚主義路線的態度，恰不是對人民負責的態度。在他們心中的對上對下是「命令」的簡單兩個字，見之於他們行動的，對上對下也都是「命令」的簡單兩個字。他們忘掉對人負責與對上級機關負責的聯繫，他們即不考慮「任務」與人民利益的聯繫；而且往往把原來正確提出的任務用簡單的方法用幾個幹部決定「佈置」下來，強迫羣衆去執行，不和羣衆商量，不讓羣衆自由發表意見與決定問題或找出解決問題的道路，甚至對於羣衆提出意見其問題，預先即已在幹部中佈置了「答覆」。他們完全不待羣衆的思想與行動成熟，自己想幹，就幹雖然也給羣衆東西，但並沒有和羣衆仔細商量，沒有通過羣衆自己領導，和力量，第一，就不會給好不會給得妥當；第二，羣衆對於所給和所得的東西，會抱着消極和懷疑的態度，或者不樂意接受；第三，機械所給的東西是不鞏固的，怕麻煩結果就會造成更多的麻煩。爲人民立功這是好事，只是我們共產黨員要做的。但要指出：有些同志不管在任何場合，對任何事情還寫着自己標功，從自己「標功」「爭功」出發。他們追求的是數字，天曉得各種數字是按自己的主觀編造的，「是以能够填出表格爲滿足，他們求上級機關獎勵自己的功勞，」而沒有想到一切功勞是必須經過羣衆批准才算的。有這種想法的同志辦事，是以官僚主義路線的方法，來代替羣衆路線的方法。有事和羣衆商量這是毛主席羣衆路線的主要精神。毛主席對一個外國記者還說過：「在我們工作中決定的因素，我們是去發現那些政策是人民大眾接受的，而那些政策老百姓是有意見或提出反對的，只有證明了爲羣衆

所擁護的政策才能成爲我們黨的政策。

毛主席這些話證明了爲大衆所擁護的政策才能成爲我們黨的政策。但是更能够決定又怎樣能够証明什麼是大衆所擁護的政策呢？顯然的，如果不從群衆中來，仍不能決定也無從證明；就是誠心須要和群衆商量，聽取羣衆的意見，向他們學習，在執行我們黨的政策的時候，在調查我們黨的政策是否正確的時候，都必須聽取羣衆的意見，都必須以羣衆的意見爲準繩。

(三)羣衆有無限的思想創造力。顯然的，在共產黨內也有某些黨員瞧不起羣衆的意見的，認爲羣衆是「無知」，而自己總是「聰明絕頂」的。因此，有事也就不願意和羣衆商量，自己壟斷，一意孤行；必須警醒這種共產黨員，不是自覺或不自覺的，他們這樣是把自己的觀點落到國民黨的觀點裡面去了。這種觀點，是與毛主席的思想相共產黨的思想不能相容的，「衆人是聖人」，這是民間的一句老話，大衆的智慧是無限的；只有羣衆才具有最大的創造力，只有集中大衆的智慧才是最大的智慧。事實上，任何困難的問題，自己在腦中想不通的東西，一和羣衆商量便能迎刃而解，釋然貫通。這是許多在革命上有經驗的同志所熟知的，特別是毛主席經常用這種經驗告訴了同志們。不幸的，就是我們有些同志，時常對於羣衆的創造熟視無睹，他們認爲那不過是「小小」的一句話或一件事，用不着去驚奇的。就在土地改革上，到處都有羣衆的創造，舉例來說，根據一位同志的反映，一九四三年開減租時，靜樂地壕村有一個地主想逃避減租，使用鬼計手段來賣地給幾個富農和富裕中農，說了好價錢也定了，正要寫契，可是許多貧苦農民就利用了民主政府法令的保護佃權，沒有讓他賣成。四四年開清算時，那個地主退出了二百畝地，三座院子，原來這二百畝是由三家富

格中農包租下來，先自己把好地坪地種上，再把剩下的壞地租給二十五戶中貧農，地租攤派，好地壞地一樣，因為這裏邊有剝削，村裏人就叫那三家爲「二地主」這時地主退出，那三家企圖壟斷好地，對群眾說：「以前誰種的地現在是給誰」，群眾們說：「這地租作三輩子，坪地壞地好地賴地種地種過，你們給我們那一件子，你們現在全種的是好地，你們要地好地分了，剩下賴地給我們我們不要。」那三家說：「要提起以前來鬧不清」，但群眾就主張那三家算賬退租，那三家又不想退租，又不願讓給群眾好地，村裡吵成一片弄不清，一位幹部當時沒有把握，有一天遇到三個老漢，他們就提出了意見：「把村裡有地的人，開，從沒地的人一截一截的分」。這意見就啓發了幹部們的思想。開了羣衆會，羣衆把三家駁倒了，分地時幹部說：「怎麼分？」群眾說：「從根子上分，地少的先分，地多的後分，人多的多分，人少的少分」。結果組織了「土地分配代表委員會」，按照羣衆的原則，從村裏敲鑼的起，按人口把土地分配了。在減租清算時代，這可說是羣衆一種很的創造，這個創造，第一、阻止了地主把土地轉化爲白洋，躲過土地改革的企圖；第二、說明地主幾輩子的剝削，好地壞地誰都種過，改變了當時許多地區「誰種誰誰」的不公平分配方法；第三、按人口實行公平合理的平均的土地分配方法。當然我們接觸的這個材料還不很完全，而當時這種創造無窮地也還是初步的，不完全的，粗澀的，但這個例子就充分說明羣衆的創造力。按照一位幹部的回憶所說：「七、八天我們幹部開不開的事情，經過羣衆的話，一夜就解決了。」再舉例說，最近臨縣縣家坡的土地分配，羣衆早有新的創造，即重將土地評出產量，定出二種產量標準，按人口貧苦程度平均分配。如每三分一石五斗產量地，而且是就無地少地農民的貧苦程度再分爲三等，定出二種產量標準，按等級平均分配。實行這種辦法的結果，是無地

貧農和赤貧爲第一等，每人（復員軍人和單身以二人計）分兩石產量的地，缺地很多的貧農爲第二等，每人分一石七斗產量的地。缺地不多但須補地的次貧農爲第三等，每人分一石五斗產量的地。據群眾反映這種辦法最公平。（按產量最合理）因爲按一種產量標準平分，無地和赤貧比次貧農還是吃虧，這個創造的內容，就是解決了按貧苦程度分配的原則。

此外根據各地土地改革的工作團的報告，各地群眾在土地改革運動中的創造簡直是很多的。群眾的創造總是生動活潑的，他們沒有死板的公式，沒有死板的表格；他是按照具體的情形。因此創造的東西就有極豐富的複雜的加以揣摩。而各縣區各地鄉村具體的情形，時常是有自己的特點或者有差別的。因此創造的東西就極豐富的多樣性。這種根據自己鄉村具體情況的羣衆自我創造，適合了羣衆的要求，因此就爲羣衆所擁護，就有最大的生命力。只要我們能够真誠地謙遜和羣衆商量，聽取羣衆的意見，並善於啓發周圍羣衆的創造力，就會不斷地無限地湧來。相反，如果我們的態度是傲慢和武斷，對於羣衆的意見不是傾聽而是不理，不是啓發而是壓制；那麼就一定損害羣衆的思想創造力，可以說毫無例外，各地工作團到各方去，是工作有較多創造而做得最好或較好的，一定是因爲和羣衆商量得最多；是工作缺乏創造而做得較差或最差的，一定是因爲和羣衆商量較少或者是沒有和羣衆商量。多事情做得好而有一件兩件做不好的，大概也總是因爲這一件兩件沒有先和羣衆商量。不和羣衆商量，就不能知道羣衆的需要，就不能有深入的調查研究，就不能確定爲當地當時羣衆所確實（是說確實的，不是說表面的形式的）能够擁護的工作步驟與鬥爭方針，就不能够照當地當時的具體情況逐步提高羣衆的覺悟（由個別利害的覺悟，提高到一般羣衆利害的覺悟，由經濟的覺悟提高到政治的覺悟），就不能使羣衆的思想和行動成起來自

然而地走向革命化，就不能使群眾自己決定並自己動手起來按照毛主席所提出的自願的原則處理自己的問題，就不能把問題解決得讓羣衆真正滿意。因此，在工作上也就一定不能夠有什麼真正的創造來。

(四) 羣衆思想方法的特點之一。這裡不準備講羣衆思想方法一切的特點，這裡只說羣衆思想方法一個最大的特點。羣衆說是真正羣衆的處理問題的所以容易妥當，容易公平與合理，就是很善於對各種事情不斷反覆地加以各種比較。比如前面引的靜樂地壕村羣衆對於土地分配的看法，便是做了各種比較，不只是比較現在，而且還比較過去（如說「這地租了三兩輩子，坪地、坡地、好地賴地誰也種過。」）他們又比較地少的與地多的，比較人多的與人少的。郝家坡羣衆把農民的貧苦程度定爲三等，也就是一種比較就是從反覆比較中得出的結論。羣衆們在攷察問題時，從反覆比較中找出差別，發現矛盾，因而又找出解決問題的方法。他們比較當地當時具體的真實的東西，訂出處理問題的一般辦法。又在處理問題時，大家更具體的一件一件地比較，一家一家地比較，比如在真正實行羣衆路線去分配土地的地方，羣衆就是對於每個具體家庭每塊具體土地實行了這種反覆的比較、反覆的揣摩；按照人口需要與貧苦程度比來比去，拉上拉下，因此就能夠處理得妥當，就得到了公平，得到了合理。完全可以說：如果沒有這種羣衆的比較與揣摩，單憑工作團與少數人處理就一定不能有公平、不能有合理，這種公平與合理，完全是由羣衆的來比去而得的結果。在各地方發生的幹部問題，基本上是農民階級內部的問題，是農民內部的幹部與羣衆之間關係的問題。那一個幹部是好的，那一個幹部是壞的，那一個幹部犯了錯誤，但是可以教育的；那點有功那點有過，那點是優點那點是缺點，通常在羣衆心目中都是有一個比較的。把幹部問題交給羣衆去

批評、去教育、去處理，讓群眾們在集體的場合再加以一番認真的審慎的比較，那末就一定不可能發生個人的包庇、袒護也一定不會有埋沒。換句話，就一定能够處理得妥當，能够公平，能够合理。這樣使幹部經過羣衆教育的大力量，獲得了真正的改造。而且羣衆也教育了改造了自己；這樣就一定能够把幹部與羣衆間的相互關係弄清楚，而達到了幹部與羣衆的真正團結。當然，羣衆並不是清一色的羣衆，包含着各種不同的階層，以至不同的階級，不但如此，在羣衆中覺悟程度也時常不一樣的；有先進的、有中間的、有落後的，因此就會有各種不同的意見。但是在羣衆場合他們也就會把各種不同的意見加以比較而比來比去，就會肯定出一種爲大家所共同承認的或多數所承認的意見。經過羣衆把各種不同的意見反覆討論爭論反覆比較之後，最後大家或多數亦肯定的意見，往往是最妥當或比較妥當而錯誤性是最少或較少的。在羣衆的反覆討論爭論反覆比較之後，正確的意見才會突出出來，而正確意見的被肯定，又往往是在討論中間比較中更加充實起來，並吸收了各種意見中那些可能比較妥當的部份，集中爲完整的或比較完整的正確意見，而那些不正確的意見，就會在這爭論和集中的過程中淘汰了去。這種經過羣衆討論與比較之後所集中起來的意見，乃是當地當時羣衆覺悟程度發展的尺度。我們辦事是須要根據這個尺度辦的，離開了這尺度，如果「不及」就是右的機會主義，如果「太過」，就是「左」的機會主義，或叫做冒險主義、關門主義。一方面我們不能遷就落後份子而忽視羣衆正當的利益，例如僱貧農的利益；（但另一方面先進階級或先進份子的意見，需要取得羣衆多數的同意與擁護）例如：僱貧農主動爭取中農同意，否則就會陷於孤立，和羣衆商量，是在各種場合中進行的，個別的談話、集體的談話、小座談大座談、不同階層與不同階級的談話等等，只要我們用心，不論在任何場合都可以啓發自

己的思想。比如前見靜樂坊塚村關於分配土地的方法，就是一個。鄧忽然從三個老漢口中的話得而啓發，而後再在群眾會上展開起來，爲群眾所明確地肯定。當然對於群眾意見採取自流主義的態度也是不對的。領導的人同樣地需要把群眾那種比較揣摩的方法化爲自己領導的方法，就是把各種不同的意見也加以比較揣摩，看出它們的不同階級內容，看出它們的差別與矛盾，看出它們的合理或不合理，而再加以選擇融會肯定與否定，聯合或鬥爭，而確定問題確定政策，通過群眾自己，以步步提高羣衆的覺悟。這就是毛主席所說的：「集中起來保持下去」。反覆比較揣摩方法，這是群眾的眞正科學分析的方法；這方法無疑的是需要爲我們一切工作者所學習的。有了這樣的分析方法，就能够避免個人的沖動與武斷，而在任何場合都可容易避免錯誤。

(五) 放手走群眾的路。孟子書上有一段話：「左各皆曰賢未可也，諸大夫曰賢未可也，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聽，諸大夫皆曰不可勿聽，國人皆曰不可然後察之，見不可焉，然後去之。……」這段話很好，按照我們的情況來說：就是這樣，根據幹部說的話還不行，根據積極份子說的話還不行，根據羣衆說的話就行了；有事只和幹部商量是不夠的，只和積極份子商量是不夠的，必須進一步和羣衆商量。這對於我們幹部是極重大極嚴重的問題。過去許多工作沒有做好，就是因爲沒有認真實行毛主席這種態度這種方法。我們黨的政策原來是從羣衆中來的，但是如果我們下級幹部沒有執行政策的羣衆路線，有了好政策也是枉然。我們幹部必須堅決澈底的拋棄官僚主義的老一套。概括前面所說，可以歸列到下面幾條：(一) 大家都齊心真正學習毛主席當羣衆的一個小學生，有事和羣衆商量；(二) 信任羣衆的正確，靠羣衆決定才能解決問題，所以要放手把問題交給羣衆。

衆去討論和處理，但是我們的錯誤都在羣衆面前公開承認，羣衆所認爲不適當的決定，聽憑羣衆翻，由羣衆來重新決定，要根據羣衆的意見來改造我們的各種幹部與組織；（三）不是硬套公式，而是從當地當時的羣衆具體情況出發，根據羣衆的覺悟判定，去啓發與提高羣衆的覺悟，在羣衆出於內心自願的原則之下，幫助羣衆逐步組織起來，逐步的展開爲當局當地內外環境所許可的一切必要的鬭爭（見「論聯合政府」）；（四）我們不是主張尾巴主義或自流主義，而是要善於把羣衆的意見集中起來，轉化爲指導羣衆運動前進的指南針，把羣衆考察問題和解決問題的方法，轉化爲我們指導羣衆的方法；（五）這樣就能走到領導方針及領導骨幹與羣衆的一致，能够使得我們這個偉大的爲人民服務的黨底「每一步驟和每一行動自然而然的走向使羣衆革命化」，並將鞏固羣衆由鬭爭中得來的一切果實。最近有一個工作團從鄉下回來，帶來了那裡一個農民所說的幾句話：「政治要放在民間；過去作事情是上頭往下，現在做事情是要從下往上掏。」這幾句話說的真好；我們現在做事情要和羣衆商量，就是要「從下往上掏」，這就是前面所說的一切。

【新華社陝西二日電】